

目 录

中国优秀农业科学家丁颖教授.....	任 凡 (1)
信宜籍的同盟会员.....	陈启著 (4)
高州风云录.....	陈 兴 (14)
高州籍将军简介——北伐、抗日战争时期.....	李以勋 (20)
“一二八”抗日淞沪战役亲历记.....	李以勋 (26)
记孙中山的忠实卫士李东英.....	李以楷 (30)
久不见 长相忆.....	沈丽坤 (32)
往事依稀忆华公.....	何茂先 (35)
✓ 敦·李孝式爵士.....	冯廷泉 (36)
陈沛将军与三次长沙大捷.....	陈燕茂 (39)
第四次长沙会战中的梁汉明将军.....	陈燕茂 (47)
许国锋与“圣殿看操”事件.....	邓文威 (50)
乡心 (诗)	义 一 (52)
邓龙光与秀川图书馆.....	朱仁中 (53)
高力士史料.....	卢 宁 (55)
苏轼为冼庙作“铭志”诗.....	陈红胜 (59)
举人黄羲轶事.....	李发文 (60)
信宜移民概况.....	赖德荣 (61)
古代茂名的瑶人.....	陈水润 (64)

中国优秀农业科学家丁颖教授

任 凡



丁颖教授铜像

丁颖字竹铭，一八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清光绪十四年农历十月二十二日）诞生在广东省高州县（原茂名县）谢鸡乡石塘村一个农民家庭。他生前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华南农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科协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被授予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东德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和捷克斯洛伐克农业科学院名誉院士等称号。他毕生从事高等农业教育和稻作科学研究，不但桃李满天下，而且在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稻科分类、稻作区域划分、水稻的系统发育理论、选育良种以及对水稻品种进行光、温生态等方面的研究取得卓越的科研成果，他的水稻“千粒穗”科研成果闻名于世，他一生的科学论著共一百四十余篇，为新中国的稻作生产和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

自一九一二年十二月间，他三次东渡日本留学。立志致力“民生”，决心要使“吃亏吃不尽的中国农民开始与现代科学发展联系”。一九二四年，他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业部毕业回国以后，在中山大学农学院任教。他曾四处奔走呼吁，请求政府增加农业基本建设和农业科研投资，以解决广东稻作生产、水利、肥料、品种和提高栽培技术问题。但到处碰壁、求援无门，只好调整研究方向，把主要精力放在选育稻种工作上。一九二六年，他用野生稻与农家品种杂交育成“中山一号”，是世界上首次把野生稻成功的转移于栽培品种。目前，闽、粤晚造大面积栽培的“包胎矮”等就是用这个品种经过

系统选育而成，历五十年而不衰。一九二七年，他首先在茂名县公馆墟边购买土地，建造简易工房，成立“中山大学南路稻作育种场”。他亲自担任育种场主任，和两名技术员、七名工友一起，不避寒暑、不顾劳累地工作。在六十亩长年干旱的“望天田”中开展了以选育水稻良种为主，包括施肥、灌溉、绿肥、防治病虫害和气象观测等多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随后，他又在广东省其他地区共建五个稻作试验场。总场设在广州石牌。经过多年辛勤劳动，终于选育成功六十多个水稻良种。农民们都亲切地称他为“谷种佬”，成为华南采用现代科学技术选育水稻良种的第一人。一九三六年，他又用印度野生稻与广东栽培稻杂交，获得世界第一株“千粒穗”类型，（共结一千四百多粒），曾轰动东南亚稻作科学界。他经过几十年的试验研究，认定中国栽培稻种并非自外国传入，而是起源于华南热带亚热带地区。他对稻种系统分类，对全国稻作区域划分，以及所创立的“水稻品种多型性”等学术观点，至今仍为我国稻作生产和科研所沿用。他晚年组织全国十二个科研机构分别在全国六大稻作带、八省区的十个点上，进行对一百六十一个水稻品种光温生态方面研究，尽管是一项未竟的试验，但已经为我国科研和生产发展提供一定理论根据。

丁颖教授一生正直朴实、治学严谨，他常教导子女们说：“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要求子女们不要去追求物质享受、虚掷光阴。他对子女们说：“我从来不把你们当作私有财产，而是把你们看成我的学生。我迟早要将你们交给社会，归还国家的！”在抗美援朝时，他极力鼓励子女参军，参干，保家卫国。据他家乡故里人反映：“十二公（他排行十二）见到钱不是弯腰去拣，而是一脚踢开。”他的学生们写文章称颂他是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一代良师。

他编写教学讲义时，经常去向农民请教。后来，和许多农民中的先进模范结为知己。解放前，他是中山大学仅有的两个“穿唐装”名教授之一。解放后，他成为中外闻名的科学家，仍以布衣淡食为荣。他到各地考察，总是首先脱了鞋袜下田，有时当地领导怕他年老受凉，劝他不要下水，让别人把稻株和泥土取样拿到田埂上观察。他笑着说：“不下田亲自踩一踩，就不知道土质到底怎么样？”又有一次看入了迷，伸手去摸禾苗时，不知不觉地把脚也伸进水田里去，布鞋湿透，自己还不知道。

丁颖教授一生为科学，为教育，呕心沥血，死而后已。他十分珍惜时间，从不浪费一分一秒，既无星期天，也没有节日地日夜忘我劳动。为了争取做更多的工作，他总是想方设法压缩睡眠和休息时间。他不止一次的说：“睡眠占去一个人生命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太可惜了。”一九六四年五月，他带病连续到宁夏、甘肃、山西、陕西、新疆考察三个月。八月份又赶回北京参加有十多个国家的专家们到会的科学讨论会，在会上做了水稻光、温生态学术报告。会后就病倒了。他

在北京病情稍好，又跑到山东临沂盐碱地去考察，并做学术报告。因病情恶化，被送回北京医院，十月十四日，他因肝癌晚期，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终年七十六岁。经过周恩来总理签阅的首都各界对丁颖教授的悼词说：“丁颖同志一生充分表现一个又红又专的科学家高尚品德，为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者和农业教育工作者树立了光辉榜样。”国外许多水稻专家也纷纷发来唁电，深切哀悼这位杰出的农业科学家。

为纪念丁颖教授，鼓励后代继承发扬他的献身精神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作风，华南农业大学自一九八四年起创立丁颖科学基金会，长期奖励和表彰在农业科学教育和学习农业科学技术中取得优异成绩的教育工作者与学生。一九八八年，华南农业大学举行建校三十六周年暨纪念丁颖教授诞辰一百周年时，在校园内隆重举行丁颖教授铜像揭幕仪式。农业部何康部长题字。相重扬副部长，广东省委郭荣昌副书记，华南农业大学卢永根校长为铜像揭幕。这座高二点五米的半身铜像由广州美术学院老师们创作，广州精密仪器厂铸造。

丁颖教授德高望重，学术造诣专深，谆谆善诱，诲人不倦，不断引导学生学农、爱农、堪称一代名师。他严于律己、坚持真理、承袭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为后人树立了好榜样，也为茂名史册留下光辉一页。

本文承华南农业大学宣传部梁深洪副部长协助，提供资料，特此致谢！

（题头书法：吴兆奇）

（任凡原名施巩秋，曾任茂名石油工业公司研究所书记兼所长，现已离休）



信宜籍的同盟会员

陈启著

《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签订以后，随着政府一天天腐败，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运动和社会政治运动也日益兴起。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代表人物孙中山于1894年11月在檀香山创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次年，又在香港建立香港兴中会。随后，华兴会和光复会等反清革命团体相继组成。宣传革命的刊物大量出现，革命思想广为传播。至1905年8月，在孙中山倡议下，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联合光复会成员，在日本东京组成中国同盟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在国内外各地建立同盟会支部和分会。创办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宣传革命，同改良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革命浪潮波及全国。

信宜虽地处粤西山区，但因一批青年先后考入广东高等学堂、两广方言学堂、广东法政学堂、广东警察学堂、黄甫武备学堂、陆军速成、虎门讲武堂等处学习。他们在那里认识了胡汉民、朱执信、古应芬、赵声、潘达微等一批老同盟会员，并由这些老同盟会员介绍，一批思想倾向革命的青年学生，陆续参加了同盟会。其中比较主要的有林云陔、林树巍、陆任宇、陆志云、梁树熊、陆耀文、陆匡文、陆幼刚、李怀霜、甘熙初、陆杰民、李拔萃、梁卫平、梁禹平、熊达、陆嗣曾、林伯虎、李卓立、梁泽汜、梁若谷、罗辉堃、李锡颐、李肖翰等人。这些信宜籍的同盟会员，追随孙中山革命，从中国同盟会成立起至孙中山逝世止的20年间，分别参加了“钦廉上思起义”（又称“戊申马笃山之役”）、庚戌“广州新军起义”、辛亥“黄花岗之役”、辛亥革命、讨袁运动和讨伐陈炯明战争等。有的后来还成为孙中山身边的重要工作人员。他们在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重大事件和关键问题上，坚持不懈，作出了历史贡献。他们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有五方面：1、领导高州起义成功；2、讨袁运动中，组织领导南路地区讨袁倒龙运动；3、陈炯明叛变时，冒死救护孙中山脱险；4、讨伐陈炯明叛军战争中，切实做好后勤工作，保证讨贼军的军需供给；5、坚定地成为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大造舆论。现分述于下：

光复高州的领导核心

领导光复高州是林云陔。

高州光复之前，林云陔从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为武装起义光复高州打下了良好基础。

1904年，林云陔和李卓立在高州学习时，组织了“新高同志社”进步团体，冒着生命危险从广州湾（今湛江）购买清朝政府禁书《黄帝魂》、《革命军》、《警世钟》、《浙江潮》、《二十世纪之支那》等进步、革命书报，组织青年秘密传阅。1908年，陆匡文等人在高州崇实中学读书时，又组织“雄辩学社”进步团体。“新高同志社”的信宜籍青年均参加这个组织，除组织青年阅读上述革命书报外，还购买《民报》、《民立报》秘密传阅。同时，定期讲演，广为传播革命思想，提高青年爱国思想，团结革命力量。从思想上、革命舆论上为高州起义作了大量的有效的准备工作。

1906年，林云陔与林伯虎、陆嗣曾、李拔萃、陆幼刚等分别考入广东高等学堂、两广方言学堂、广东警察学堂、广东法政学堂、陆军小学堂等校读书，林树巍、甘照初等入陆军速成学堂学习。他们在那里先后加入同盟会，并保持与设在高州的“新高同志社”、“雄辩学社”密切联系，还介绍这两个团体的进步青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这些同盟会员成为辛亥革命高州起义的主要骨干，为光复高州作了严密的有效的组织上的准备工作。

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前夕，林云陔、李拔萃、陆嗣曾等人奉朱执信、赵声之命，从广州赶赴高州进行活动，组织响应“广州新军起义”的军事行动——武装起义。1910年元旦，林云陔等人回到信宜县城（今镇隆镇），通过同盟会员陆匡文召集信宜的同盟会员于莲花庵（今镇隆镇北畔村）举行会议，具体研究发动武装起义计划和分工组织实施起义计划的方法措施。后因“广州新军起义”提前行动失败，便暂停起义准备工作，随即根据参加了“广州新军起义”后从广州回来的林树巍所传达朱执信的意见，继续做好发展同盟会员工作，进一步扩大革命力量。在信宜设中国同盟会南方支部信宜分会，要求加入同盟会的日益增加。在大力发展同盟会员的同时，加紧组织武装力量的准备工作。短短时间内，信宜同盟分会便成为南路地区一个重要的革命组织和主要力量。

不久，林云陔接朱执信通知，回广州参予准备第二次广州起义“黄花岗之役”的具体工作。信宜组织武装力量的领导工作交由林树巍负责。林云陔在广州租双门底王家巷“詹同文笔店”后屋居住，暗中作储藏转运枪炮弹药的机关，大量购买武器。朱执信在“黄花岗之役”中，在进攻广东督署时受伤，撤退到林云陔处隐藏和救护，住了三夜，后林云陔给他化妆，秘密护送撤离广州赴香港。

“黄花岗之役”失败后，斗争形势十分紧张，清朝政府加强防范，加上广东各地土匪又很猖獗，各处官绅急请清政府派兵前去清剿。两广总督张鸣岐受到“广州新军起义”和“黄花岗之役”两次打击后，既害怕新军再次起义，又害怕各地盗匪附和革命，于是决定派新军远离广州，企图达到既可清剿土匪，又防止

新军再次起义的一箭双雕的目的。便派广东陆军小学总办黄士龙任高州清乡总办，他率两个营驻防信宜，在县城郊区农村瓜棚为营地，进行军事训练。林树巍、陆匡文接林云陔通知，利用这个新动向多做新军下级军官和士兵工作。一方面积极购进枪弹，另一方面到新军中秘密发展同盟会员，作新军起义的准备工作。后被黄士龙发觉，不能按预定计划实施。接着，林树巍串通一个理发匠，布置他在给黄士龙理发时把黄杀掉。由于理发匠胆小，临到给黄士龙理发时害怕起来，险些暴露机密。但林树巍、陆匡文坚持做新军工作，取得很大成效。新军标统（团长）饶景华、队官（连长）邹武、罗中流与林树巍密切来往，表示愿意支持革命。与此同时，派陆耀文、甘熙初到信宜团防局发展同盟会员，组织“选锋队”（敢死队）。“选锋队”不但有武器，而且又经过军事训练，有作战能力。决定起义时以这支队伍为主要武装力量。

在同盟会信宜分会的组织领导下，革命力量发展很快。正在形势顺利发展的时候，武昌起义爆发了。林云陔奉同盟会统筹部胡汉民、朱执信之命，担负领导光复高州的重任。他与林伯虎、陆嗣曾、陆幼刚等先赴香港领取枪弹、军饷，然后分别经江门赶回高州。在高州城“鸿渐馆”召开同盟会主要骨干会议，研究情况，分析形势，决定起义计划。宣誓要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和勇敢牺牲精神，务求起义完全成功。设起义总指挥部于文明门的冯屋。在林云陔的指挥下，兵分几路迅速向高州包围过来：由林树巍率信宜“选锋队”首先打响第一枪，从信宜出发急行军向高州城挺进；陆志云、陆师歧、梁卫平、梁禹平在广州湾（今湛江）郊区坡头运动民军开赴高州；陆耀文率领水东民军北上向高州进军；陆任宇、李拔萃、李肖翰等在高州城内做好内应工作；梁树熊、陆匡文在总指挥部协助林云陔做好联络工作；调新军苏慎初和巡防营管带（营长）张锦芬和部分民军严密监视高雷道尹彭言孝（彭手中掌握数千清兵）行动。当各路武装部队包围高州城之后，林云陔亲自率领部队冲入高州府，清兵看见大势已去，纷纷缴械投降。起义军很快占领高州府道台衙门，宣布起义胜利。高州光复了。1911年11月13日，高州军政分府宣告成立，林云陔任分都督，梁树熊掌理民政，陆匡文掌理财政，苏慎初掌理军政。林云陔通令各县同盟会迅速组织起义，光复县城。黄士龙、彭言孝看到起义军势力强大，率新军和巡防营退逃广西，高州光复后，又把队伍拉回广东，退驻水东，由水东撤退，再回广州。从此高州所属6个县全境光复，高州起义取得预期的成功。

南路讨袁的中坚力量

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篡夺了政权，派人刺杀国民党主要领袖宋教仁，签订善后大借款，妄图改制称帝。为推翻袁世凯，挽回辛亥革命的失败，1913年孙中山发动讨袁运动，“二次革命”开始。信宜县国民党分部长陆匡文会同

南路各县国民党分部长、各社团联合通电讨袁，动员各界人士以实际行动同袁世凯的篡权罪行进行坚决的斗争。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于1913年8月3日任命龙济光为广东都督兼民政长，并授予陆军上将衔。龙济光竭尽全力为袁世凯效劳，不惜一切手段镇压广东革命党人。

针对袁世凯、龙济光狼狈为奸的情况，邓铿（梅县人）、朱执信（番禺人）根据孙中山的意见，决定举行“三次革命”。朱执信将两阳四邑司令林树巍调任高雷司令，领导南路地区的讨袁倒龙运动。

在林树巍的指挥下，梁树熊与薛岳（乐昌人）、林直勉等人赴广州湾组织讨袁倒龙的武装力量。于广州湾赤坎，由李卓立出面租“长安店”设指挥机关，并以“南兴店”、“广怡华”杂货店作联络各地军政人员的联络站和招待所。派陆志云、梁弼平、李锡颐、谭惠泉（茂名人）、熊英（茂名人）等分别负责信宜、茂名、电白、化州、吴川等县讨袁倒龙运动的领导工作，广泛动员民众，加紧组织武装力量。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工作，林树巍率领革命党人和武装部队举行起义，迅速占领电白县。当讨袁运动取得初步胜利的关键时刻，龙济光的党羽、高雷道尹王典章突然照会广州湾法国租界政府，诬陷林树巍等革命党为土匪，行将抢劫广州湾，总愚法驻广州湾当局派军警包围“长安店”和“广怡华”等机关，逮捕林树巍、梁树熊、梁弼平、陆师歧和薛岳、林直勉等8人。王典章还指使遂溪、吴川县长企图引渡林树巍等回高明加以杀害。在紧急关头，陆耀文赶赴澳门面报朱执信，由朱执信转报孙中山。孙中山即照会法政府提出抗议，加上广州湾赤坎商人潘葆光、翻译王镜秋等人联名报告法政府当局，证明林树巍等8人是孙中山革命派的革命党人。法政府将林树巍等8人解送越南河内，免遭杀害。王典章见此计不成，又利用革命党的变节分子李铁城为鹰犬，突然引兵搜索设在赤坎“南兴店”的机关，大肆镇压南路各县的革命党人。由于王典章的破坏，使南路各县革命党人准备起义的计划不能实施。结果，南路讨袁倒龙运动遂告失败。

孙中山在日本加紧倒袁的准备工作，不断派干部回国策划一系列反袁暴动。1915年12月2日派朱执信为中华革命军广东司令长官；1916年1月4日派陆任宇为高雷司令官，指挥高雷地区的讨袁运动。陆任宇接受孙中山的命令后，即与张发奎（始兴人）、李章达赴南路组织开展讨袁运动。先派陆志云、陆耀文、熊英（茂名人）等到广州湾赤坎，在李卓立的商店设讨袁指挥机关，开展与各县革命党人掌握的军队联络。后又派陆幼刚、陆匡文回信宜筹粮筹款，组织信宜革命党人起来参加讨袁运动。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后，陆任宇等赴化州，茂名指挥起义，率队经茂名西部的沙田向高州进发。后因袁世凯在高州的势力过大，未能攻入高州城。起义队伍向北前进，开入信宜，由信宜转两阳四邑。1916年5月9日，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陆任宇根据孙中山“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出于

国内”的号召，派梁树熊到广州继续筹办经费购买枪弹；派从越南释放回国的原高雷司令林树巍任讨袁司令部经理局局长，负责招收兵士和筹集军械，并负责组织训练工作。经过一个多月工作，已集中壮年近千人。正开始训练之际，传来袁世凯忧惧而死的消息。不久，孙中山即电告高雷司令陆任宇，暂停此项建军计划的实施。调陆任宇、林树巍回广州服务于大元帅府。

救护总统的忠勇义士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第二次护法政府，就任大总统。当时，林树巍、陆志云、甘熙初、陆任宇等人在大本营工作，赖达在粤军（陈炯明部）任少校连长。

1922年在平定粤桂两省之后，孙中山为了打倒军阀，统一中国，重建共和，亲自率领大军，先后到桂林、韶关，督师北伐。大本营金库主任林云陔、度支处主任陆幼刚均随孙中山在北伐前线服务。当时担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北与北洋军阀吴佩孚、曹錕勾结，南同湖南省省长赵恒惕搞联省自治，阴谋破坏北伐，反对中国统一，处处给孙中山掣肘。起先令所部粤军五十个营从广西搬兵回粤，继则以辞去本兼各职为要挟，迫使孙中山放弃北伐，叛逆之心日渐暴露。孙中山以团结为重，于1922年6月1日毅然从北伐前线韶关回到广州，以诚相见，教育陈炯明以革命为重，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但陈炯明由于得到吴佩孚、曹錕的支持，妄图保持两广地盘作南面王，决定发动叛变，炮轰总统府，阴谋杀害孙中山。他于1922年6月13日下达密令，命叶举部占领广州东西北郊各战略要地，伺机进行叛变。这时赖达所在的陈炯明部陈德春第五独立旅奉命回驻广州。赖达沿途听到不少对孙中山不利的消息。他回到广州后，立即找到林树巍、陆志云、甘熙初、陆任宇，将不利于孙中山的消息见告。林树巍听到这一情报后，嘱赖达随时注意和了解陈炯明军的机密，及时向他报告。

1922年6月15日，林树巍约林直勉、陆志云、陆幼刚等人会集于广州东横街梁树熊的医馆内，交换情报，分析动态，研究应急对策，决定由林树巍、陆志云直接与赖达联络，切实掌握陈炯明的军事动态。是日晚上10时左右，赖达参加旅长陈德春召集的团、营、连长联席会议，得到手令。陈德春命其所属的第一团布防沙面、黄沙一带；第二团即时吃饱饭，全副武装开赴观音山脚与叶举部湘军李云复团互相配合，准予16日凌晨3时围攻总统府。赖达得这一准确的军事机密后，即刻设法秘密潜出，化妆成富商，在陈塘找得两个妓女，挟妓乘车而过陈炯明部队的步哨，直接找到陆志云和林树巍，报告了紧急军事机密，并立即见总统府秘书林直勉。于是林直勉、林树巍、陆志云在当晚12时左右赶到孙中山驻地粤秀楼，把陈炯明已下达密令调动部队，决定立即发动叛变的特急军情向孙中山作详细报

告。陆志云说：“我有个在陈德春部队当连长的同乡名叫赖达，他向我报告了陈炯明叛变的确切机密情报。他说，陈军在今晚深夜3时开始攻击总统府，口号是“食饱饭，杀民贼”，这个消息十分确实，情势很险恶。因此，请大总统速往别处，暂时避开。”孙中山听后说：“竟存（陈炯明）纵然恶劣，料不至此。即使竟存有不轨之谋，但他的部下有不少是明理正直的人，他们很多和我久共患难，岂肯尽听竟存之命？请各位无须过虑。”林树巍接着劝说：“粤军（指陈炯明军）素来野蛮，不能不防备。”劝孙中山离开粤秀楼，但孙中山表示不离开驻地粤秀楼。林直勉、林树巍、陆志云只好退出。由于事态发展越来越紧张，救孙中山的责任重大，林直勉、林树巍、陆志云又火速跑步去见孙中山，再三苦劝孙中山大总统要迅速离开此地。在千钧一发、最危急关头，他们拿白色夏布长衫给孙中山穿上，还给他戴上一副墨色眼镜，将孙中山化妆成一个医生，然后强行扶挟孙中山离开粤秀楼，步行小路，经芒果街、连新街，走到惠爱路，正要横过马路入桂香街时，被陈炯明叛军哨兵拦阻，不准通过。哨兵盘问：“往何处去？干什么的！”林直勉指着孙中山对哨兵说：“我母亲患了重病，所以不得不深夜请来这位医生到家里诊治。”但哨兵仍不许通过。林树巍则说：“我们住在高第街，你们如若不信，就请一齐和我们到家里看看。”哨兵看见孙中山确象个医生模样，就让他们通过了。当林树巍等护送孙中山由马鞍街转小市街靖海路时，又遇到陈炯明叛军数百人，适路中有人力车十余辆，孙中山等四人态度从容镇定，分散从人力车中间穿过，叛军哨兵没有怀疑，便安然通过。从此则沿长堤走到海珠岸边，雇一小艇渡江往海珠海军司令部。海军哨兵盘问，林树巍回答，说是重要的公文必须亲交温总司令（温树德），温树德出来，见是孙中山，便请一同登楚豫舰。此时，炮声四起。这是陈炯明叛军洪兆麟部4千余人于16日凌晨3时，围攻总统府，炮轰粤秀楼的叛变行动。但大总统孙中山已安全脱险，转危为安了。登上楚豫舰后，即研究开展讨伐陈炯明叛军的战斗。

讨贼战争的得力后勤

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组织大规模讨伐陈炯明（又称“讨贼”）的战争。在讨贼战争中，林树巍等人在军事上担负重任，不怕牺牲追随孙中山革命；林云陔等人则在财政经济上肩负重任，为争取讨贼战争的胜利而克服种种困难，筹集粮饷、武器装备，保证军需供应。

在讨伐战争初期，陆任宇、陆杰民、甘熙初等人奉命到陈炯明叛军中做秘密策反工作，因叛徒告密，被陈炯明杀害。后葬于广州市东沙路二望岗，人称“信宜四烈士墓”。

林树巍在讨贼战争中一直在第一线与叛军拚搏。1922年冬，林树巍担任高雷讨贼军总司令，离开总统府从广州出发，驰赴高雷，兴师讨贼，激战数月，把陈

炯明余部余汗卿数千之众打败，使高雷地区恢复和平。1923年12月，桂系军阀陆荣廷部申保藩侵犯化州廉江等地，陆志云奉命从广州赶回高州协助林树巍率师征剿，申敌败退钦州。1924年春，陈炯明残部邓本殷、吕春荣等联合，以万余之众，竭尽全力进犯高雷。林树巍当时处在内无储粮、外无接济的极端困难条件下，抵抗邓本殷、吕春荣的进迫，坚守弥月。1924年春，林树巍率部退至两阳四邑，继续开展讨贼战斗。同年10月22日，奉孙中山之命回广州大本营效劳。

在讨贼战争中，遇到一个大难题是军需供给紧张，常常遇到供不应求的情况。为解决军需供给问题，林云陔、陆幼刚、陆志云作出了贡献。在陈炯明叛变前夕，陆幼刚到广东省银行专访行长黄隆生，提出领取款项以应军需急用。但由于陈炯明派军需连日守提现金收入，分文无存。根据这个情况，经反复磋商，说明是孙大总统指示要提取的。黄隆生行长只好将已签印尚未发出的小额省行券，拨解一部分，由银行沙面办事处交叶副官押送至宝璧舰，再转运讨贼军前线。接着，陆幼刚又赴广州湾与高雷各县长磋商，共同努力，结果筹集到一批粮饷，迅速将款项解送广州。林云陔在军饷紧缺的时刻，从讨贼战争前线几经辗转赶到上海向孙中山报告和请示解决军需问题。奉孙中山之命由上海直到香港筹款，经与香港爱国同胞和海外华侨讨论，很快筹集30余万巨款，亲自运回内地，由陆幼刚解送到前线交东路讨贼军总司令许崇智，及时解决军需困难，支持讨贼战争顺利进展。

为了军需支出能够长期得以保证，为此孙中山对广东财政收入不佳的现状进行整顿。如两广盐运使所属的香安局，由于局长梅放洲玩忽职守，挪用公款，抗缴税金，贪污腐败，以此抵制讨贼战争。孙中山作出改组香安局领导的决定，于1924年1月24日任命陆志云为香安局局长，撤销梅放洲职务。陆志云到职后，遵照孙大总统的部署，深入调查研究，迅速查清情况，将梅放洲的营私舞弊、违法乱纪，抗交公款等严重问题，直接报告孙大总统。孙中山据此即下达通缉令，通缉捉拿梅放洲归案严办，没收其营私的巨额款项。陆志云秉公执法，从而使香安局所管辖的财税收入大幅度增加，悉数上缴总统府金库，使讨贼军供给大为改善。这是当时广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财源。

此外，持续二年讨伐陈炯明的战争，还遇到广东与各驻军的电话通讯十分混乱，很不适应形势发展要求的严重问题。孙中山亲自过问此事，1924年7月8日决定任命政绩突出的香安局长陆志云为广东电话总局局长。陆志云到职后，雷厉风行，整顿了松、散、乱的局面。迅速制订出新的规章制度，并报大总统审批。由大总统通令各总司令、各军军长及其所属官兵，一律遵守执行新订的《广东电话总局规章制度》，从而使电话的管理制度，由军队到地方机关都带头执行，电话通讯系统的面貌为之一新，保证讨贼战争军事情况上通下达，使指挥机关及时准确了解战况，大大有利于讨贼战争进行。

宣传革命的新闻尖兵

在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有不少进步文人在宣传革命、提高民众觉悟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信宜籍人李怀霜便是其中一个。

李怀霜是同盟会的老会员，也是进步文学团体“南社”成员，1910年3月，他与同盟会员夏重民邀请汉冶萍公司股东广东人陈芷澜出资，在上海租界望平街创办《天铎报》，李怀霜任总编辑。《天铎报》开始是以商业性报纸的面目出现，不久便积极宣传资产阶级革命，与于右任、宋教仁主办的《民立报》相呼应。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以“铁路国有”为名，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干线的铁路建筑权出卖给英、法、德、美等帝国主义，激起一场“保路运动”。李怀霜主编的《天铎报》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发表了青年文人陈布雷（后为蒋介石的近臣，幕僚长）致当时《中国新报》主编杨度的书信，明确表示：坚决反对清政府出卖中国经济利益的行径。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帝国主义侵略者却把军舰开进长江，企图干涉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当时，在帝国主义势力很强的上海，许多报刊仍对武昌起义持反对态度，把革命军称作“逆军”，把起义的革命行动称作“叛乱”。李怀霜主编的《天铎报》则以《谈鄂》为题，连续发表十篇评论，旗帜鲜明地支持武昌起义，支持各省纷纷响应的革命行动。这十篇时事评论连续刊出之后，不啻晨钟暮鼓之轰鸣，震聋发聩，对革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刚刚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于1912年1月4日用英文写出《对外宣言》，派外交总长王宠惠专程从南京带到上海，交李怀霜主编的《天铎报》译成中文，《天铎报》于1912年1月5日独家首先发表，顿时声震寰宇。1912年3月，袁世凯篡权窃国之后，李怀霜主编的《天铎报》连续刊登大量宣传民主革命文章，宣传“二次革命”，对袁世凯的窃国罪行作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宋教仁被暗杀于上海，李怀霜坚持正义，不怕风险，写下了《宋钝初先生谏并叙》，高度赞扬了宋教仁的业绩，表示了自己坚持革命的决心：“君骨可朽，吾头可断，此恨不遂泯也。”“先生往矣，国命如何？茸茸伊发，历历楚歌。吾种不忘，朽腐其芽。”激愤之情，溢于行间。袁世凯对李怀霜和《天铎报》的反袁言论又怕又恨，于1913年8月25日下令封禁了《天铎报》，李怀霜被迫出走海外。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并亲任大元帅。为了从舆论上大力支持孙中山的护法政府，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斗争，于是年冬，李怀霜请老同盟会员甄亮甫与陆军部次长崔文藻出资创办《珠江日刊》，李怀霜任总编辑，继续为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大造舆论。在他的主持下，《珠江日刊》积极宣传民主革命，公开揭露那些对抗孙中山军政府的军阀行径。1918年4月，政学系头目李根源勾结桂系军阀莫荣新，排挤孙中山及孙中山革命派，囚禁了军政府陆军部长张开儒，杀害了陆军部次长崔文藻。李怀霜以《珠江日刊》为阵地，旗帜鲜明地公

开揭露李根源勾结莫荣新所干的一系列阴谋罪行。同时,还将李根源抢占地盘,把持广东税收的劣迹详细地全面公诸于众。李根源、莫荣新对此十分恼恨,杀气腾腾,采取了各种卑劣手段,限制《珠江日报》,打击李怀霜和甄亮甫。甄亮甫看见这个大打出手的架势,秘密地离开广州。《珠江日报》处在这种情况下,被迫停办。李怀霜冒着生命危险,为尽量减少报社经济损失,千方百计办好报社财产转让手续,怀着悲愤之情离开广州。

〔附录〕信宜籍主要同盟会员简介

1、林云陔(1883——1948),原名公竞,字毅为,信宜县水口镇大桐官岸村人。1906年考入两广方言学堂读书,由朱执信介绍参加中国同盟会,参加辛亥“黄花岗之役”,辛亥革命时领导高州起义,任高州军政分府分都督,民国建立后任广东省都督府秘书,不久被派赴美国留学,学成回国驻上海,在孙中山直接领导下,与朱执信任《建设》杂志编辑,将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英文稿译成中文,后随孙中山回广东,历任登记局长,孙中山总统府秘书,广东省教育会编译处主任,大元帅府大本营金库长兼广西省银行行长,广州市长,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广东省主席,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常委、审计部部长、审计长。

2、林树巍(1889——1949),字拯民。信宜县镇隆镇荔枝村人。1906年进广东陆军速成学习,加入同盟会,先后参加了庚戌“广州新军起义”,辛亥“黄花岗之役”,辛亥革命高州起义时,任信宜先锋队(敢死队)指挥。辛亥革命后,历任两阳四邑司令,高雷司令,孙中山总统府参军,高雷讨贼军总司令兼高雷绥靖处处长,中山县警察局长,信宜县参议会议长。

3、陆任宇(1890——1922),信宜县水口镇水口村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在林云陔指挥下参加辛亥革命高州起义。民国成立后被选派日本留学。回国后任高雷讨袁军司令。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奉命深入到陈炯明叛军内做秘密策反工作,事败遇害。

4、陆志云(1883——1943),信宜县水口镇水口村人。同盟会员,曾参加“黄花岗之役”。参加辛亥革命高州起义。民国成立后参予高雷讨袁运动的军事工作,孙中山总统府特务长,大本营辎重大队队长。后历任香安局局长,广东省电话总局局长,封川县长。

5、梁树熊(1871——1926),字辛尝,信宜县镇隆镇大水坡村人。高郡中学堂倡办人之一。1910年参加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高州起义。高州光复后任高州分府民政长。讨袁运动中被袁世凯爪牙诬害,受广州湾(今湛江)法租界政府逮捕送河南关押。释放后,历任孙中山军政府秘书,廉江、茂名、增城、宝安、鹤山等县县长。

6、陆耀文(1884——1951),原名志武,字耀文,信宜县水口镇水口村人。1909年毕业于广东虎门讲武学堂,经朱执信介绍参加同盟会。奉命回高州从事发展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密谋响应“广州新军起义”。辛亥革命高州起义时,与林树巍任信宜先锋队(敢死队)队长,率队参加高州起义。民国成立后任番禺县首任县长。“二次革命”后,奉朱执信之命收集各地讨袁动态亲赴日本向孙中山面报。后随孙中山回国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副官,北伐时任大本营副官,讨贼军第四路军总司令,高州六属剿匪委员会主任,国民中央财政部印花税总处长,茂名县长,中央审计部参事。

7、陆匡文（1892——1964），原名煥，号曾陶，又号陶庵。信宜县水口镇水口村人。1910年与林树巍组织中国同盟会南方支部信宜分部，并任分部长。参加辛亥革命高州起义，高州军政分府成立，任财政长。民国后，历任信宜、遂溪、清远县县长，孙中山大元帅府法制委员会秘书、经界局秘书，国民党广东省监委、执委，广东省临时参议员，信宜县临时参议会议长。广州行辕中将政务处长，广州绥靖公署中将秘书长，国大代表。

8、陆幼刚（1893——1983），号厉庵。信宜县水口镇水口村人。参加辛亥革命高州起义。民国元年入北京大学肄业。北大毕业回广东参加讨袁运动，赴日本服务于孙中山左右。随孙中山回国，历任大元帅府秘书，法制委员会委员、江门市长、广州市政府秘书长，广州市土地局、财政局、教育局局长，广东省政府秘书长、代省主席，国民党中央监委、国民党军风纪巡视团中将专员，广州市参议会议长，国大代表。

9、李怀霜（1874——1950），原名茂荣，字兼浦，又字怀江，1910年改名怀霜。信宜县镇隆镇大路街人。清朝举人。致力于文学创作及新闻事业，著有章回小说《炎蛾灯》等作品。与晚清著名作家吴沃尧（又名吴趼人，笔名我佛山人）交往甚密，作《我佛山人传》，高度评价吴沃尧。他加入同盟会和“南社”后，任《天铎报》总编辑，积极宣传辛亥革命，后又任《珠江日刊》总编辑，大力宣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曾任清远县长，江西省政府、广东省政府秘书。

10、梁若谷（1892——1978）又名虚怀，广东省信宜县思贺镇寨岗村人。他于1909年（清宣统元年）考入广东新军（驻燕塘）炮科学习，后加入同盟会。先后参加了“广州新军起义”、“辛亥广州起义”（黄花岗之役）和光复广州等革命斗争。在“黄花岗之役”前夕，参与协助温生才刺杀清朝广州将军孚琦的行动。辛亥革命后，1911年随陆海军北上抵南京，任炮兵连长，1913年升任少校营长，1915年回粤，任讨袁军第一支队上校司令，1917年任粤军炮兵团上校团长。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梁若谷任讨贼军攻城司令，旋任中央直辖军第一路中将司令。1923年调任东路讨贼军第四军十三旅中将旅长。率部开赴增城、博罗、河源一带参加讨伐陈炯明叛军的战斗。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独立团少将团长。1930年之后转到地方任职，先后任新丰、河源、大埔、阳山等县县长。1949年赴台湾，1978年病逝于台北市。

1983年4月初稿，5月修改稿

（陈启著是广东省茂名市信宜人，县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高州风云录

(1911—1925)

陈兴整理

辛亥革命时期的高州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辛亥年八月初九)中国同盟会领导武昌新军起义,各省先后响应。时高州会党蜂起,并提出“推翻满清,杀绝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口号。道台彭言孝下令各乡捕送会党成员来府城监狱。接着以“洗监”为名,大杀狱囚。十一月九日广州各界人士开会决定,推举革命党人胡汉民为广东都督,宣布广东共和独立,清政府两广总督张鸣岐逃去,广东新军镇统龙济光在民军及各界舆论压力下退避梧州。消息传出,各地会党首领和一些地方民主人士纷纷起来组织民军,进攻郡城。当时,高州城已有革命党人活动,陆匡文、周伟民等人在高城文明门冯屋建立了联络机关。林云陔、熊然、林伯虎、陆嗣曾、陆幼刚等先后汇集高州,策划起义。清政府道台彭言孝、新军统领黄士龙还拥兵自固,声言要杀革命党。城中风声鹤唳,居民日夕虚惊。十一月中旬,谣传广东都督已派高奇英率兵到罗定,林树巍由信宜率领革命党到高州。城中各校教员、局绅、商民集会于学府应变,推举代表李镜台等人劝说道台彭言孝、镇台吴祥达、知府毕昌言、茂名知县杨庶祺等交印离去。驻高州新军统领黄士龙原是镇压民军的急先锋,此时也拥兵不动,彭言孝自感无法维持,率清兵及一批大小官吏向广西逃去。

十一月二十三日,革命党人拥林云陔进入道台衙门,宣布高州反正。二十五日,高州都督府成立,推林云陔为都督,陆匡文掌财政,大局初定。参议谭惠泉赴省谒见胡汉民汇报高州光复情况,并请拨款支援。二十九日,接上头命令,取消都督府,改称军政分府,以黄元贞为军政长,苏慎初为司令长,陈耿孚为参谋长,林云陔为民政长。此时黄士龙尚带有新军,认为军政分府实力薄弱,欲进驻

高州。经革命党人力拒，黄不得逞，遂移兵水东劫掠盐田财物为饷。适省府拨来银元一万元，黄又拟截留，几经交涉取去了五千元，并以留下何乃益营为条件。何营副营长车驾龙、连长邹武、高群英、车渭英等均是高州人，已加入同盟会，不受黄士龙指挥。于是高群英由秋林征兵营带兵入城，维持治安。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一月一日，孙中山亲任临时大总统。二月十二日清帝溥仪退位，南北和议达成。孙中山于四月一日退位，由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袁拒绝南下任职，广东军权仍在前清提督龙济光手中，各地掌握军权者多为龙的旧部。先后出掌高州的段尔元、王纯良、王典章等，均与革命党人为敌，会党、民军时遭杀害。革命党人依然无法左右大小军阀的行动。

二次革命在高州引起的风波

袁世凯虽然当上了临时大总统，但又觉得总统还要受到国会制约，于是就多方策划恢复帝制，以达到当皇帝的欲望，这就是辛亥革命后第一次全国性的封建势力的公开复辟，由此而引起了“二次革命”。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三月，袁派人刺杀国民党主要成员宋教仁于沪宁车站。七月下令免去广东省都督胡汉民职务，改任陈炯明为都督，同时还免了江西都督李烈钧职务和褫去黄兴、柏文蔚、陈其美等革命党人的职务。十月份，公然解散国会。袁世凯的复辟行为遭到全国各地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强烈反对。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春，高州革命党人曾组织起义军起来反袁。是年十月，革命党人邓铿、朱执信又在广东策划大规模反袁讨龙军事行动。将全省分为东北和西南两方面。高州属西南第五路，由朱执信领导。十一月，朱委派李海云、林拯民发动高州起义，占领电白县城，据城四天，后因内部分裂，外无援兵，被迫撤退。为了镇压起义，袁世凯派王纯良为高雷镇守使，王典章为高雷道尹，“二王”均为龙济光旧部。这时龙已被袁起用为“振武上将军”，主管两广。“二王”到高州后即下令大捕革命党人，为袁称帝开路。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王典章捕杀高州人士吴应中，并对革命党人廖春鸣等施以酷刑。陈积文、梁彬基等七个辛亥革命人士也先后遭到杀害。是年秋，李海云、熊英、谭汉奉中华革命党南方支部长命令，又带领同志来高州密谋起义，事泄，便离开高州。因反袁行动暂告失败，党人多逃往香港、澳门、日本等地避难。王典章假各学校机关团体名义通电对袁“劝进”，拥袁称帝，并通令各机关团体于次年春改元“洪宪”，引起社会各界反对。当时，高郡中学学生张昌言挺身而出，对校长陈宪弼盗用学校名义，通电拥袁称帝一事，进行口诛笔伐。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云南蔡锷护国军兴，各地纷纷响应。是年四月，革命党人李海云、熊英、陆任宇等人回茂名策动讨袁。时高雷护国军总司令车驾龙

已率队进城，自任高雷镇守使，其部下原营长邹武为高雷道尹，梁冠文为茂名县长。李海云等人只好撤回信宜活动。

在广东各路讨袁军蓬勃兴起的形势下，龙济光见势不妙，被迫退下海南岛。“二王”亦随龙部撤出高州。

桂系势力在高州的变易

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原是广西的土匪、流氓，加上清代一些官吏和军队组成的地方军阀力量。民国成立后，他们看风扯幟，打出护国旗号，投机革命，但又在行动上排挤革命势力。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革命政府利用桂、滇、粤三方面军队组成讨袁联军，经过几番战斗，总算是把袁世凯在广东的势力驱出大陆，窜下海南岛去了。但从此广东的局面又成了桂系的天下。四月，隆世储奉命任高雷镇守使，范云梯为高雷道尹。原镇守使车驾龙被桂系将领林虎在席间扣留，解除军职。隆世储到茂名后先后几次到茂西一带剿灭了张玉初匪帮。在剿匪过程中及迫降后，共杀数百人。

龙济光被压到海南后时刻窥伺反攻大陆。十一月，北洋政府委龙为两广巡阅使，意在挑起龙对广东内陆的骚扰，借以加重其对南方军政府的压力。龙受委任后声言要到广州就职。十二月，龙以所部数千人在徐闻登陆，占领雷州半岛及沿海数县。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一月十八日，龙军攻占化州。高雷镇守使隆世储从高州带兵前往阻击，在笪桥、良光一带发生遭遇战，隆部败退。败退官兵在抢渡罗江时，浮桥不稳，人马拥挤，隆落水溺毙，李军乘胜进入高州。龙入高州后，设巡阅使行署于旧镇署，建筑七层碉楼于署左，号称“帅府”，还在城西观山建楼自居，命名为“镇武楼”。从此高雷一带又属北洋政府势力所占有。

龙济光驻高州后大量扩编地方团队，委派地方势力头子任团、营、连长，如安良堡的梁拜卿等人均自行组织军队，被委为营长调往信宜效力。一些缙绅遗老也纷纷取出珍藏已久的朝衣补服，弹冠相庆。

四月西南军政府分六路进攻龙济光，其中刘达庆部出岑溪逼近信宜，激战于硃砂白石，在东镇收缴了龙的新编部队军械，龙军退缩高州城。刘部经黄塘、良德进迫高州。桂系沈鸿英部由合浦出石角袭击廉江的龙军后路。龙见大有被围歼之危，便于四月十八日退出高州，经化州、梅录下赤坎，由水路逃返海南岛。高州又由龙手转为桂系所占。广东政府委派陈德春为高雷镇守使，高州人张锦芳为高雷道尹，刘伟才为茂名县知事。

十一月广西陆荣廷派其部属林俊廷接任高雷镇守使，陈、张两人都调省另用。

从一九一七年起桂系势力盘踞广东实际是陆荣廷通过其亲信莫荣新对广东的